



吴石：“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身影默默无闻却功勋卓著。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周旋在虎穴狼窝，隐蔽战线的残酷常人难以想象。然而，为换山河无恙、人民解放，一批批我党地下工作者冒死前往。吴石就是这样的人。他身着国民党中将军服，以隐蔽身份战斗在敌人“心脏”，用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为我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他本可功成身退，却为实现祖国统一坚定选择“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诠释了信仰最纯粹的模样。

吴佳熹



名的佳绩闻名全校，被誉为“吴状元”。随后他东渡日本，先后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在校时，他是能文、武、诗、词、书、画、英语、日语、骑、射、驾、泳的“十二能人”，毕业时，他的成绩在两所学校均排第一。学成归来，吴石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本部就职，同时兼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官，其间研究撰写了《兵学辞典粹编》等十余部军事理论著作，是国民党军界公认的“日本通”。1936年，吴石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他身居高位，仕路坦荡，盼以军事才学救国家于积弱。

“吴状元”平步青云

1894年9月14日，吴石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寒儒世家，父亲是清末举人，满腹学识，后在乡村公学执教。幼年的吴石随父入学，咏诵过目不忘，成绩名列前茅。1908年，14岁的吴石进入省城开智学校，在这所具有革命性的新式学堂里，吴石读懂了列强的侵略、祖国的衰败、帝制的腐朽和百姓的困苦。1911年，福州光复，吴石少年从戎，响应辛亥革命，报名参加了北伐学生军。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当天，18岁的吴石奔赴南京，担任开国典礼的警戒任务员。1914年，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毕业时，他以同期第一

为我党提供绝密军事机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石十分赞同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8月，他在武汉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前来授课，他还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谋出路。之后，经历了豫湘桂战役的惨败，目睹了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吴石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感叹。此时的他无关党派，只为苍生。1947年4月，愤懑于国民党官员沉湎享乐、不顾民生、战场溃败、决策混乱，对国民政府极度失望的吴石通过好友、辛亥元老何遂的牵线搭桥，在上海锦江饭店秘密会见我党上海局领导。何遂之子何康陪同，他回忆：“他们大概在里面谈了一个小时，出来后便微笑着相互道别，我便知应该是建立了某种联系。”从此，何康成为吴石的单线联系人，吴石为我党工作的序幕正式拉开。那时的吴石，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利用职务之便，他积极掩护地下工作，策反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传递了大量核心军事机密，成为扎在国民党心脏上的一柄“利刃”。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49年8月，解放军剑指福州，胜利的曙光清晰可见。吴石接到急电，命他赴台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是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当抉择来临，吴仲禧劝他考虑：“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毕竟你已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吴石未曾犹豫，认为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他不怕死，只怕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只怕失去促成祖国统一的机会。赴台前一天，他嘱托随从参谋在福州解放后将298箱军事档案全部交到福州市军管会手中。8月16日，吴石踏上了飞往台湾的专机。看似赴台履新，实际为我党完成更重要的任务。为了确保吴石这条重要情报线的畅通和安全，党组织安排陈宝仓、朱枫等人成为他在台湾的帮手，组成“吴石情报组”。在台的日子比预想还要凶险，白色恐怖中，吴石用专业和智慧多次冒死传递情报。10月开始，我军进攻金门、舟山相继失利，吴石以梳理西南地区的防御漏洞为由，调阅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等绝密文件，将关键信息记下，通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在多个关键节点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绝密情报。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已加入我党做地下工作的吴石的同乡挚友吴仲禧，借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赴徐州“剿总”视察。吴石亲自写信让学生李树正给予关照，助力吴仲禧顺利将“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主官姓名、兵力配备、作战意图等关键机密文件传递给解放军。这些绝密文件后来被确认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最早有比较全面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绝密情报”。同年底，吴石出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后，通过化名“吴寿康”的中共中央情报部福建情报负责人谢筱迺，提供了国民党军在福建及台湾的军力部署等诸多重要信息。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吴石乘坐火车往返南京和上海，亲手将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敌我双方态势图等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交与何康，图中标明的部队番号详细到团。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回忆，吴石提供的这份情报让解放军确定了渡江主攻方位，“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大大减少了战役伤亡，为南京、上海、福州等重要城市的解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特殊贡献。

过朱枫传递给大陆。他以一名参谋人员的立场思考我军需要的情报，在一个月后将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和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海区海流资料，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等几乎涵盖了台湾所有军事防御要素的情报送至我党。然而，当一切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时，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入狱。他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酷刑，一只眼睛被折磨至失明。6月10日，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将吴石、朱枫等4人执行死刑于台北郊区马场町。临刑前，吴石留下绝命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从容的神态彰显着他坚定的意志。

吴石、朱枫等后来被迫认为革命烈士，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为他们雕刻的塑像屹立于广场中央。毛泽东当年为他们题的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被刻在碑上。

据《学习时报》

沈从文扶植文学青年

沈从文初闯文坛时，曾遭遇困难，后幸得徐志摩、郁达夫、胡适等人扶持，才渐获声誉。由于这段经历，沈从文对扶植文学青年格外热心，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金钱。

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依托报纸平台，发现和培养了李同愈、刘祖春、李辉英、程万孚、程朱溪、隽闻（玉林）、徐转蓬等青年作者。此外，每隔一两个月，他还邀请青年作家聚会交谈，地点选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或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五龙亭，议题多以文学和写作为主，所约人员中有王西彦、杨刚、芦焚、刘祖春、严文井、李威深、屈曲夫、田涛等。“每次都是沈从文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由他付钱作东。”

沈从文借助在文学界的影响，时常为文学青年的作品出版提供帮助。1931年，北大学生卞之琳的诗作辗转到了沈从文手上。沈从文把这些诗作编成《群鸦集》，并在《创作月刊》上撰文推荐。卞之琳读到这篇文章后，喜出望外，创作信心大受鼓舞。后来，卞之琳的诗稿《三秋草》由新月书店出版时，沈从文不仅欣然题签书名，还慷慨地资助30元。

《刘宇诗选》的出版也得到沈从文的资助。沈从文编选刘宇诗歌《骆驼》《假如我要来》《械斗》《肉与死的搏斗》等31首，称赞他“感情很厚，想象很美，看得宽泛，写得亲切，将使新诗别开拓一种境界，为他人无从企望的完美境界”。

萧乾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篱下集》的出版，是沈从文促成的；王西彦第一本小说集《夜宿集》，从选编到接洽出版，也是沈从文一手操办的；沈从文还选编了胡不归的诗集《牵牛花》；他为《高植小说集》作序，称赞高植把文学当作事业，“用的是最傻的也正是最诚实可爱的方法来写作小说”。

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不顺当。沈从文知道后，便给胡适写信，希望能通过文化基金会，给卞之琳一点可以发挥其特长的翻译工作。后来，卞之琳确实获得了一份为文化基金会翻译文稿的工作。

王剑 据《人民政协报》

顾颉刚的“抗日月捐”

九一八事变骤起，山河破碎，燕京大学校园内群情激愤。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旋即成立，顾颉刚与容庚、洪业、郭绍虞、吴文藻、容媛等九人挺身而出，组成“抗日十人团”第一团，其后，郑振铎、雷洁琼、高君珊等亦相继加入，抗日救亡的薪火在燕园熊熊燃起。

据雷洁琼晚年忆述，抗日会规定中国教职员自愿按月扣薪1%至4%，专款用于犒劳前线将士及抗日活动。这或许是中国知识界最早的“月捐”实践之一：不是一时冲动的倾囊豪捐，而是默默支持的坚守。彼时顾颉刚月薪360元，按上限扣除4%，即每月捐出14元4角——这笔钱在当时足抵普通家庭一月开销。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恰逢顾颉刚南归杭州省亲。燕大抗日会已从教职员捐款中拨出千元犒劳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消息传至杭州，顾颉刚致信妻子殷履安：“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之生死关头，而十九路军实为起死回生之一针。这是值得我们国家家家口祝的。”他更欣喜地写道，杭州家中的父亲、母亲、姑母等长辈皆愤然支持“抵抗日本”，足见“民气之盛”。他深感自己与妻子“不能直接卫国，凡可出力的地方总要出力”，并叮嘱妻子，若燕大方面再行派捐，务要多认一些，“因为如果亡国，钱多亦无用也”。寥寥数语，道尽书生报国的决绝与清醒。

之后，燕大抗日会会长容庚一方面应郑振铎之议组织教职员再度为十九路军募捐，另一方面召开会议重审按月扣薪捐助抗日之事，虽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但到会的燕京大学53位教职员均赞成从1932年3月起继续扣薪，直至战争完结为止。

吴子明 据《人民政协报》